

跨国并购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本刊记者 张蕊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是近年来全球跨国投资格局中少数扩大投资的国家之一，特别是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直保持活跃状态，并购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出海”有助于其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壮大；更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但持续壮大的“出海”队伍和并购规模，也带来了贸易摩擦增加、投资保护主义兴起等问题。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应对新挑战，利用新形势，本刊记者日前在高顿税务高峰论坛上，专访了长期从事企业跨国并购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并购思路需转变

记者：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跨国并购队伍，总体情况怎么样？

张文魁：我国企业全球并购的脚步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金融危机后逐年升温。2010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金额近400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514亿美元，增长了近30%。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901亿美元，其中用于并购的是514亿美元，并购类投资占整个对外投资的比例近60%。二是跨国并购是企业并购的主要选择。从2012年开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金额远远超出境内并购金额，2013年我国境内并购400多亿美元，跨国并购超出境内

并购金额近30%，我国企业在并购决策上更倾向于跨国并购。三是跨国并购更多地发生在美欧等成熟市场国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域选择逐渐发生变化，已经从投资周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初期阶段，进入了积极大胆地向美欧成熟市场国家投资的新阶段，目前90%的并购发生在欧美。四是并购主体方面，国企是主力军，民企是新生力军。从投资份额来看，国企仍占较大比重，但随着政府以简化审批手续、帮助融资等复合式鼓励政策，大量民营企业参与其中，成为跨国投资浪潮中的新生力军。五是产业选择方面，仍以资源、能源为主，但随着民企的加入，呈现产业流向更加多元化和高附加值的特点。

记者：与几年前相比，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环境是否有变化？

张文魁：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些很有趣的变化。从国内来看，好像是一幅“自相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全球去投资，如火如荼。这让人感觉中国经济很繁荣，中国人很有钱，到处买东西，到处投资。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国内GDP增长只有7.4%，是这么多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还有一些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几个月，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在明显上升，我国整体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很多人甚至担心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化解这些因素，会导致我国经济出现危机。从国外来看，好像又是另一幅“自相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我国企业到当地修路建桥，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建厂，提供工作机

会；另一方面，被投资国似乎不怎么买账，不仅奥巴马指责中国搭便车、澳大利亚首富辱华言论等个案时有发生，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回头之势。

这些“自相矛盾”的图景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我们把全球并购的重点放在自然资源的获取，很多国有企业去国外买矿、买森林或者长期租赁土地，在美洲、欧洲、非洲都有。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到了真正要转变增长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候，不能再停留在过去那种过度依赖要素投入和货币增长的轨道上，不能再按照过去过度依赖成本控制和环境牺牲的逻辑去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讲“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更多地依靠生产力的提升，更多地依靠全球竞争力的升级，在这种新的轨道上增长。尽管我们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在8%或者8%以下，但是我们会更好的增长质量，会有更好的百姓生活水准的提高和民生福祉的改善。这种新常态的实现需要我们去做好很多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实现全球并购的升级。过去几年我们的企业将跨国并购的重点放在资源领域，对于缓解我国资源贫乏的状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合算。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产品和矿产产品，本质上是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商品，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善的、运输通道是安全的，那么我们并不一定要通过并购获得所有权这种方式来控制资源。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技术能力等无形资产不一定能够通过市场买卖

来实现。虽然也有技术交易市场,但是技术交易最终还是要通过学习、消化、吸收才能获得。在我国经济向新常态转变,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候,我们更要注重技术能力的获得和提升,即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重点要转变,要从过去以获得自然资源为主要目标转向转型升级要素的获得。

基于技术与资源的整合才能实现双赢

记者:我国企业应该进行怎样的战略调整?

张文魁:过去几年,我们一些企业特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比如说万达,收购美国MC电影院线公司,还收购了英国一个豪华游艇制造商。双汇,收购了美国最大的肉食加工制造企业。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联想收购IBM。这些跨国并购对于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刚刚调研过中联重科,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中排名第七位。2009年中联重科收购了意大利的一个工程机械生产企业,并购后建立了联合研发平台,双方定期互派研发技术人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中,研发的碳纤维技术已经应用于重型起吊设备的制造。我们在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建高楼大厦,得把材料吊上去,就需要这种很高的起吊设备。原来的起吊设备都是钢做的,需要大量钢材制造起吊臂,还需要很大、很宽的钢制底盘支撑起吊臂。中联重科和并购的意大利企业一同突破了碳纤维技术难题,现在起吊臂可以用更轻便结实的碳纤维来制造,并且实现了碳纤维起吊臂和钢制底座的安全连接,碳纤维起吊臂是原来钢制起吊臂重量的1/5。重量轻了,底盘小了,不仅能够减少底盘钢材的用量,也会增加寿命,非常受欢迎。

记者:我们的企业去国外并购拥有好技术的公司,会不会损害别国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会不会有壁垒?

张文魁:这个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是好的企业会帮助当地经济的发展。欧洲一些企业虽然有好的技术,但受制于高成本的影响,很多企业减少生产甚至停产,并购之后我国的企业会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当地的企业控制成本,比如说将部分零部件分包到中国来生产,再运回当地进行组装、销售和维修。这样可以帮助欧洲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维持运营,也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获得技术、市场和渠道,实现了双赢。

实际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对数十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我国企业,尤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越来越注重自然资源之外的一些要素的获取,调查中在问及进行跨国并购时最注重什么时,答案排名第一位的是技术研发能力的获得。然后依次是品牌、与我国业务有互补、获得销售渠道和关键零部件制造。观念和战略的转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就是增加了海外的销售 and 市场份额。这是一个综合的作用,借助于国外的技术研发平台,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借助于海外的营销网络,逐步形成了全球的品牌。第二个是增加了国内销售,技术水平提高了,品牌美誉度提高了,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度也就提高了,国内的消费者逐渐地放弃进口商品和国外品牌。被并购方,由于相应获得了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优势,不仅在原有的欧美市场更具竞争力,更获得了国内以及亚洲市场扩展的渠道和资源。

财税政策应着力于环境的建设

记者:财税政策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帮助企业实现跨国并购的升级?

张文魁:过去几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

出台了很鼓励政策。我们了解到,很多地方都有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形式的支持计划,这些支持对于没有太多国际经验的企业走出国门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从长远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是很理想,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补贴仓促甚至盲目地进行跨国并购的案例也屡见报端。企业经营行为首先要进行成本核算,原本不划算的并购投资,可能因为补贴和支持计划而划算。那么,这就是政策对企业经营行为不合理的影响。

与之相比,财税政策更应该关注跨国投资并购环境的建设。譬如,我国已经与相关国家(地区)正式签署了13项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优惠贸易安排,已经与相关国家(地区)签订了100余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工作对于降低企业跨国并购投资成本,消除壁垒,都十分关键。但还有很多方面,譬如行业准入、原材料采购、资金融通等,国外仍设定了严格的审查机制,需要政府层面的协调沟通。具体到财税部门,一方面应继续推进WTO、自贸区、投资协定、税收协定等谈签工作,推进会计、税收制度改革,为跨国并购消除障碍,营造更国际化、更开放包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应更关注对跨国并购转型升级的引导和鼓励,譬如完善被并购企业技术、专利以及品牌、商誉等在并购交易中会计、税务处理办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对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选择和操作的部署指导,更是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方向描绘的蓝图愿景,按照这个方向去走,中国经济升级版就能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变也会顺利实现。□